

亚洲产业链：现状、演变与发展趋势^{*}

李颖婷 崔晓敏

本文基于传统贸易和增加值贸易数据，讨论了亚洲产业链的现状、演变及发展趋势。过去二十多年间，亚洲产业链快速崛起，带动全球产业链从“亚太—欧非”两极模式逐步演变为“三足鼎立”的局面。亚洲产业链具备资源禀赋多样化、制造业层级梯度化、区域内贸易往来密切等特征。区域内劳动密集型产业及生产过程呈现国别“雁阵”的演变轨迹，但技术密集型产业仍主要由发达经济体掌控。2008年后兴起的逆全球化浪潮，对亚洲产业链既有总量上的负面影响，又加速其内部结构调整。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强化了已有变化趋势。在内外因素的合力下，亚洲产业链将向多元化和区域化推进，区域内产业关系将更趋于互补，各国有望在高科技领域加强合作。

关键词：亚洲产业链 逆全球化 多元化和区域化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贸易成本的不断下降，以中间品贸易和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产业链快速发展。^[1]从一个经济体单独制造到多个经济体协同以及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的再配置，全球产业链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各经济体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技术水平，融入全球化生产分工。发达经

李颖婷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Email: yingtingli95@163.com；崔晓敏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开放市场下的经济结构转型和出口份额”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和编辑部提出的宝贵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1]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是三个相互联系但未被清晰界定的概念。贺俊在“从效率到安全：疫情冲击下的全球供应链调整及应对”一文中提及：价值链是指研发、制造、销售等创造价值的活动；供应链强调企业间产品或服务的投入产出关系或上下游关系。狭义的产业链包括价值链和供应链两个方面，而广义的产业链除了狭义产业链外，还包括产业间的关系。因此，本文采用的产业链概念泛指亚洲主要经济体内部和之间的价值创造和投入产出关系。贺俊：“从效率到安全：疫情冲击下的全球供应链调整及应对”，《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5期，第79~89页。

济体将一部分生产工序外包到发展中经济体，一方面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扩大生产，另一方面为服务不断成长的发展中经济体提前布局。发展中经济体通过承接外包工序，一方面促进就业并带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学习并积累本国产业发展所需的资本和技术。随着全球产业链日益复杂化，产业链上的生产和供应商与最终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无法通过传统的进出口贸易指标进行解读。因此，有必要基于产业链分析方法，重新梳理各国和地区的资源禀赋与贸易结构的关系。

在近五十年的发展中，全球产业链经历了从早期的快速发展，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逆全球化涌动的转变。1970年以后，全球化生产开始兴起，贸易的目的不仅为了满足当地消费，以进口促出口、以各国优势资源服务全球市场的生产方式开始萌发。同时，全球化生产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并得到多国的普遍认同。然而，在快速发展之后，全球产业链的增加值占比出现回落。根据约翰逊和诺格拉的核算，1970—1980年全球出口中的增加值占比从80%以上降至75%以下，1980—1990年平缓回升，1990年以后持续快速下降，从1990年的77%左右下降至2008年的65%左右。^[1]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欧美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国际贸易往来下降。特别是2011年之后，七国峰会（G7）国家与主要新兴经济体在产业链中的参与度明显下降。尽管全球产业链在2017年回暖，但并未恢复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水平。^[2]2018—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大幅上升，加速了全球产业链的调整进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进一步引发各国对产业链稳定性和安全性的广泛担忧，加速了一些经济体对医疗、高科技等关键产业全球生产据点布局的调整。

《2017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将全球产业链按照地理分布划分为亚洲、欧洲、北美等几个部分，其中“亚洲工厂”是以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为核心的区域产业链，“欧洲工厂”是以欧洲国家为主体的区域产业链，“北美工厂”是以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为核心的区域产业链。^[3]欧洲和北美国家多为发达经济体，主要负责高技术产品和科研创新；亚洲有较多发展中经济体，其主要负责初级产

[1] Johnson, R. C., and Noguera G., “Fragmentation and Trade in Value Added over Four Decades”, No. w1818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2.

[2]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19: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upply Chain Trade, and Workers in a Globalized World”, April 15, 2019. 2000—2017年区域内增加值贸易数据均采用《2019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的测算结果。

[3]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17: Measuring and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GVC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2017,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29593> License: CC BY 3.0 IGO[2020-03-20].

品和低技术加工品生产，但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少数亚洲经济体在部分高科技产品上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过去二十年，全球产业链最大的变化来自亚洲，亚洲最大的变化则来自中国。一方面，区域内贸易的重要性不断增加，这一现象在亚洲最为明显。^[1]2000—2017年，亚洲产业链的区域内增加值贸易在总贸易中的占比从40.3%提高至46%。^[2]另一方面，北美、欧洲与亚洲产业链间的联系不断增强。2000—2017年，北美和欧洲总体的区域内增加值贸易占比下降，但是与亚洲产业链的贸易联系逐渐增强。中国逐步成长为亚洲产业链的枢纽，并与北美和欧洲产业链（分别以美国和德国为枢纽）保持密切的贸易往来关系。

20世纪3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Akamatsu）在研究日本棉纺织业的产业形态时发现，出口刺激了对纺织机械和纺织器具的需求，使轻工业带动重工业，形成“产业雁阵”。^[3]这一理论后来被用于描绘亚洲区域内产业链演变进程。具体而言，日本作为领头雁率先实现工业化，之后将劳动密集工业转移到其他亚洲经济体，并且在20世纪60—70年代带动“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的经济发展，在20世纪80—90年代带动“亚洲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利用人口红利和后发优势从亚洲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制造型经济体逐步成长为世界制造工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随着中国大陆劳动力成本的提升，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越南、柬埔寨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亚洲经济体转移，进而推动亚洲地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和发展。

本文重点关注亚洲产业链的现状及演变，分析外部环境变化对亚洲产业链的冲击，并在此基础上研判亚洲产业链的发展方向。后文安排如下：首先，基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贸易数据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1] 本文的区域产业链划分参照2017年和2019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及其他文献研究。从理论上讲，亚洲产业链包括除西亚外的所有亚洲经济体。从统计上讲，传统贸易数据包括所有地理意义上的亚洲经济体，而增加值贸易核算基于WIOD数据库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跨国投入产出表，受数据限制仅覆盖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孟加拉国以及中国台湾11个经济体。

[2] 从全球价值链核算方法看，中间品贸易与增加值贸易是不同的概念。中间品贸易与最终品贸易的核算是基于边境统计法，并且共同构成总贸易；增加值贸易的核算则需要是在边境统计法的基础上，剔除他国贡献的增加值以及重复计算。在拥有数据的情况下，本文的分析尽量使用增加值口径的统计，否则就用边境统计法下的中间品贸易指标作为替代。亚洲产业链的区域内增加值贸易占比数据是对《2019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第一章“全球生产和全球价值链参与的模式”（Recent Patterns of Global Production and GVC Participation）测算的前向和后向参与度，进行加权平均之后得到的结果。

[3] Akamatsu, K., “Waga kuni yomo kogyohin no boueki susei”, *Shogyo Keizai Ronso*, 13: 129–212, 1935.

的增加值贸易数据 (TiVA), 分析亚洲产业链的总体情况、亚洲代表性经济体贸易结构转变以及产业链位置特征。其次, 探讨逆全球化浪潮、美国政府贸易政策、新冠肺炎疫情等外部环境变化对亚洲产业链的冲击。最后, 进一步从国别和产业两个维度讨论亚洲产业链的发展方向。

亚洲产业链的现状及演变

本部分从全球和亚洲两个视角讨论亚洲产业链的现状及演变。基于全球视角, 关注亚洲与其他产业链在区域间的贸易往来及相对位置变动。基于亚洲视角, 则关注亚洲主要经济体在亚洲产业链的内部位置及其与中国的产业链关系。

(一) 从全球看亚洲

随着亚洲区域内贸易的不断增加, 以及与美国、欧洲间贸易往来的愈发紧密, 全球产业链逐步从“亚太—欧非”两极模式向北美、欧洲和亚洲“三足鼎立”的格局转变。^[1]鞠建东和余心玎也发现, 国际贸易、中间品贸易和国际投资的结构出现三极分化趋势, 形成以美国、德国和中国为中心的北美、欧洲和亚洲区域性集团。^[2]具体而言, 1995年大多数亚洲经济体依附以美国为首的“亚太社团”, 形成以美国为中心、日本为副中心的亚太产业链。中国内地处于“亚太社团”的外围, 仅与日本、美国和中国香港存在较密切的外贸联系。欧洲和非洲国家依附以德国、英国和法国为核心, 瑞士、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为副中心的“欧非社团”。而到2015年, 亚洲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赖不断增强, 逐步从“亚太社团”中分离, 形成了与欧美产业链规模大体相当的亚洲产业链, 并以中国大陆为中心、以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为副中心。此时, 北美产业链仍然以美国为中心, 墨西哥和加拿大在北美自贸区的带动下与美国联系日趋密切, 其外围还包括巴西等南美洲国家。而欧洲产业链中, 德国的贸易地位逐渐凸显并成为区域枢纽, 英国和法国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这一时期的全球产业链调整呈现出两方面的鲜明特征。

第一, 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间的贸易往来加强, 尤其是欧洲和北美与亚洲产业链间的贸易往来明显增加。2000—2017年, 欧洲与亚洲的增加值贸易往来

[1] 蒋小荣、杨永春、汪胜兰: “1985—2015年全球贸易网络格局的时空演化及对中国地缘战略的启示”, 《地理研究》, 2018年第3期, 第495—511页。

[2] Ju, J. D., and Yu X. D., “China’s Opening up after 40 Years: Standing at a Historic Turning Point”, *China & World Economy*, 26(2): 23–49, 2018.

占比由11.3%上升至16.6%，而与北美的往来占比则从13.5%下降至10.6%。^[1]类似地，北美与亚洲的增加值贸易往来占比也从2000年的19.3%提升至2017年的21.6%。在跨区域贸易中，除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掌握部分高技术产品外，亚洲产业链的发展整体上仍主要基于其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出口中劳动密集型与中低端技术密集型产品占比相对更高。

第二，亚洲产业链中区域内贸易占比较高。2000—2017年，区域内增加值贸易在亚洲产业链中的占比从40.3%上升至46%，其中东亚地区在亚洲区域内增加值贸易中占比接近80%。在全球产业链中，仅有欧洲的情况与亚洲类似，但其区域内增加值贸易占比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下降。欧洲的区域内增加值贸易占比从2000年的62.1%降至2017年的55.1%。这意味着相对其他区域，欧洲和亚洲产业链的内部融合更加紧密。从行业看，2015年，亚洲区域内的中间品贸易在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行业、化学和制药行业以及焦炭和精炼石油产品行业尤为突出，其区域内贸易分别占亚洲各经济体该行业中间品总贸易的69.8%、59.3%和58.6%（图1）。此外，亚洲超过半数的纺织服装、其他非金属矿产以及基本金属产品贸易属于区域内贸易。而区域外贸易占比较高的行业为采矿业、农林渔业和其他运输设备行业，其分别占亚洲该行业总贸易的82.6%、75.7%和73.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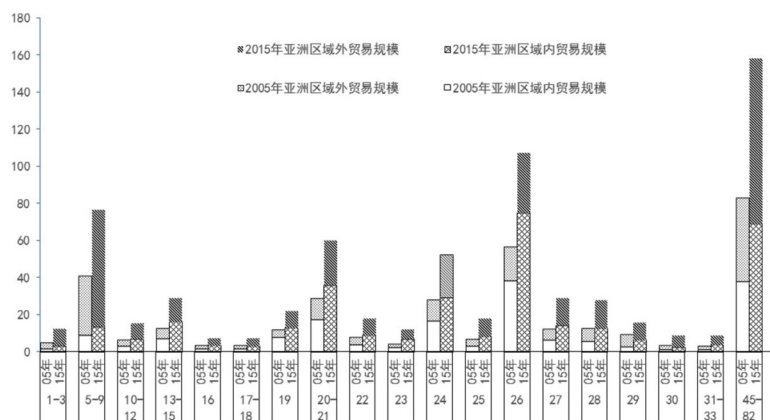


图1 亚洲区域内外中间品贸易规模（单位：百亿美元）

[1]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19: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upply Chain Trade, and Workers in a Globalized World”, April 15, 2019.

[2] 行业层面的亚洲区域内贸易基于OECD TiVA数据库中的中间品贸易数据计算。受TiVA数据库的限制，该指标仅更新到2015年。

注：图中涉及行业分类如下。1-3：农业、林业和渔业；5-9：采矿和采石；10-12：食品、饮料和烟草；13-15：纺织品、服装、皮革和相关产品；16：木材以及木材和软木制品；17-18：纸制品和印刷；19：焦炭和精炼石油产品；20-21：化学和制药产品；22：橡胶和塑料制品；23：其他非金属矿产；24：基本金属；25：金属制品；26：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27：电气设备；28：未另分类的机械和设备；29：机动车辆、拖车和半拖车；30：其他运输设备；31-33：其他制造业、机械设备的维修和安装；45-82：商业部门服务行业。

数据来源：OECD TiVA 数据库。

（二）从亚洲看各经济体^[1]

根据资源禀赋及出口产品结构特征，亚洲主要经济体可分为自然资源型、低等技术产品制造型、中等技术产品制造型和高等技术产品制造型四类。^[2]从亚洲产业链的分工、竞争与合作关系来看，亚洲产业链中的各经济体在中高端产品制造上存在互补关系；在低端产品制造上目前总体呈现竞争关系，但随着相关产业在区域内的再配置，各经济体在该领域中的关系也逐渐向互补转变。

1. 自然资源型

自然资源型经济体包括文莱、老挝和缅甸。其中，文莱的人均GDP较高，为31622美元（2019年），其主要扮演能源输出国的角色，同时也是各类制造产品的重要需求方。自2002年以来，该国90%的出口产品为矿产资源，主要为天然气和石油原油。文莱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为矿产天然气和甲醇类化工产品，这两种产品各占半壁江山。但对中国的出口占文莱总出口比例较低，文莱48.9%的矿产品都出口到日本和泰国。老挝和缅甸的人均GDP相对较低，分别是2164美元和1866美元（2019年），其主要扮演自然资源出口国的角色，制造能力相对较弱。老挝主要的出口产品是矿石矿渣、铜类与谷物，主要的进口产品是机器、石油和车辆，其占总进口的比例近50%。缅甸的主要出口产品为矿产品，2019年其占总出口的比重为24.6%，且矿产出口全部为天然气。除此之外，纺织服装产品也是缅甸2019年主要的出口产品，占总出口的比例为28.3%。缅甸主要进口石油原油，占比始终在20%以上。此外，电子、机械与车辆类产品进口占比也都超过5%。

[1] 本部分贸易数据来自UN Comtrade数据库，人均GDP数据来源于万得（Wind）数据库。

[2] 分类还参考了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全球价值链国别报告》。无特殊说明，本文的出口均指货物出口。

2. 低等技术产品制造型

低等技术产品制造型经济体包括印度^[1]、越南和柬埔寨，在亚洲产业链中处于中等偏下位置。其中，印度的人均GDP为2009美元（2019年），印度主要出口石油类（15.3%）、珠宝类（11.4%）和衣帽类产品。印度与中国在衣帽类产品上总体呈现竞争关系，但在中高端产品上依赖从中国进口的中间品和资本品。印度从中国主要进口电子类和机械类产品，其占比分别为28.9%和20.5%（2019年）。其中，67%的电子类产品为中间品，64%的机械类产品为资本品。越南的人均GDP为2566美元（2019年），越南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加工国家，平均每年出口的衣帽类产品和纺织原料占总出口的五分之一。此外，食品以及电子设备也在越南出口中排名前三。越南电子设备行业出口的增长主要得益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外商在东南亚增加投资设厂，且越南在该行业中也主要从事组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任务。柬埔寨的人均GDP较低，为1510美元（2019年），并且其主要出口纺织服装类产品（66.3%）、木制品等低技术制造品。柬埔寨主要进口纺织原料类纤维制品，其占总进口的比例为26%，且全部为中间品。其中，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原料产品就占从中国总进口的四分之一以上。近年来，全球纺织服装行业产业链开始向柬埔寨倾斜，中国与柬埔寨在纺织服装行业的关系也逐步从竞争向互补演变。

3. 中等技术产品制造型

中等技术产品制造型经济体包括中国大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五个经济体在亚洲产业链中处于中游，主要从事中低端产品和少数高端产品制造，在电子和机械产品产业链中存在一定互补关系。在这些经济体中，中国大陆、马来西亚和泰国的人均GDP较高，分别为10276美元、11373美元和7274美元（2019年）。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人均GDP相对较低，分别为3893美元和3103美元（2019年）。在近二十年中，中国大陆的出口向高技术产品转型，但是在部分中低等技术产品上仍具有比较优势。一方面，中国大陆逐步从制造低等技术产品转变为制造中等技术产品，并且出口的电子和机械类产品也向中高技术产品靠拢。另一方面，中国大陆在纺织服装类产品制造上仍然占据重要地位，与越南、印度和柬埔寨等经济体存在一定竞争关系。印度尼西亚在东南亚四国中

[1]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全球价值链报告》，印度的出口主要是信息服务业，纺织服装产品和化学品的出口紧随其后。由于本文旨在讨论货物贸易产业链，所以从制造业来看印度主要从事低等技术产品制造。

经济总量排名第一，并呈现出较强的制造实力（制造业占GDP的45.5%）。电子和机械类产品是印度尼西亚前十大出口品，同时印度尼西亚还出口了大量的矿产和宝石类自然资源型产品，以及占相当比重的有机化学品和医药产品。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主要出口电子和机械类产品，包括集成电路、半导体等。这两类产品分别占马来西亚总出口的34.4%和9.1%，占菲律宾总出口的50%和14.4%，占泰国总出口的13.2%和15.7%。然而，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较为发达的亚洲经济体相比，上述三个经济体的出口集中于中低端产品或高端产品的中低端任务。

4. 高技术产品制造型

高技术产品制造型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这些经济体的人均GDP显著高于其他组别，2019年数额依次为39290美元、31363美元、25792美元、48571美元和64582美元，并且整体处于亚洲产业链的上游。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主要出口电子和机械类资本品与中间品，包括金属氧化物半导体、蒸发式空气冷却器与自动数据处理机等高技术机电产品。三个经济体与中国大陆在该产业上存在密切的互补关系，即从中国大陆进口电子和机械产品，并向中国大陆提供中间品与资本品。中国大陆在该产业链中扮演“承上启下”的角色——从东盟进口原材料，从日本和韩国进口零部件，并将它们组装加工成最终消费品向美国和欧洲等出口。此外，日本和韩国的主要出口品还有汽车，其占两国2019年总出口的比例分别为21%和11.6%。类似地，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进出口同样以电子和机械产品为主，但二者作为自由贸易港，其贸易中相当一部分属于转口贸易。

亚洲产业链演变呈现出“雁阵模式”的特征。矿产品、纺织服装和机电产品是亚洲产业链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三类行业。其中，纺织服装和电子产品的产业链随各经济体生产成本和工业基础的相对变化而呈现出明显的演变特征。第一，纺织服装产业链实现了从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等向中国大陆，从中国大陆向印度和越南等地的两次转移，呈现出“雁阵”的特征。1995年，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是该行业主要的出口经济体。2005年中国大陆成长为纺织服装类产品全球最大的生产中心，越南则取代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跻身成为亚洲纺织服装类产品主要供应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受成本因素驱动，纺织服装类产业链进一步从中国大陆向人均收入水平更低的东南亚和南亚经济体转移。2007—2018年，除“亚洲四小龙”和“亚洲四小虎”以外的东南亚和南亚

经济体服装业出口占全球比重从9.7%上升至13.5%，增速明显提升并可能进一步加速。

第二，电子行业产业链中的中低端产品或任务也呈现出“雁阵”的特征，但高端部分仍主要由欧美各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掌控。1995年，日本是亚洲电子中间品贸易最大的枢纽国家，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为电子产品的区域副中心，此时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的地位相对外围。2015年，中国大陆成为亚洲电子中间品贸易最大的枢纽经济体，并从代工、加工逐步成长，已经具备一定的自主生产能力。^[1]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占比提升，而日本和新加坡占比下降。但中国大陆、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主要负责中低端电子产品的生产，欧美各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高端电子产品生产中仍然具有较强竞争力。例如，中国大陆出口的单价最高的电子产品为数据图形显示导管（3277.8美元）和金属氧化物半导体（2465.3美元），而欧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出口的单价较高的电子产品则为微波导管（16727美元）和金属氧化物半导体（9229美元）。

综上，亚洲产业链的发展与演变呈现出两方面特点。一是亚洲产业链崛起，并逐步从“亚太社团”中分离，全球产业链呈现出从两极化到三极化的演变趋势。随着亚洲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及中国大陆经济的腾飞，亚洲产业链的区域内贸易体量不断增加，并且其与北美和欧洲产业链之间的贸易往来愈发紧密。二是亚洲产业链的演变呈现出“雁阵模式”的特征。根据不同制造品的技术等级，亚洲产业链包括高等、中等和低等技术产品制造这三个梯队。从行业来看，亚洲纺织服装产业链、电子产品产业链中的中低端产品或任务呈现出国别“雁阵”的演变特征，但电子产品产业链中高端部分仍主要由区域内发达经济体掌控。

外部环境变化对亚洲产业链的影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低增长、低通胀、低需求和高失业、高债务、高泡沫等风险交织。在这一背景下，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浪潮来袭，叠加新冠肺炎疫情，亚洲和全球产业链受到巨大挑战。

[1] 2005—2016年，该行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上升14.9个百分点，是技术密集型行业中上升幅度最大的一个。

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有赖于积极、稳定的外部环境。反之，局部和整体的环境变化（例如贸易摩擦、区域或全球性突发事件等）都可能引起产业链的调整甚至重构。越复杂的产业链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敏感性越高。根据《2019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2—2016年当全球名义GDP增速下行时，各种类型的跨境贸易活动均有所下滑。其中，涉及两次及以上跨境贸易的复杂产业链活动（以机电产品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大多属于这一类）下降幅度最大——2012—2014年尽管总体仍维持微弱的正增长，但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已下降超过10个百分点，2015年增速甚至一度跌至-10%。2017年，全球经济景气程度回升，复杂产业链活动增速有所恢复，但生产率低迷的长期趋势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2018—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2020年全球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复杂产业链活动（尤其是中美相关部分）受到较大影响。

逆全球化浪潮冲击全球产业链。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全球化的消极影响越发突出，包括制造业空心化、失业增加、贫富差距扩大、环境资源透支甚至发生世界性金融危机和政治动乱等。质疑、批判和反对全球化的力量不断壮大，逆全球化浪潮不断显现。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WTO）多边贸易谈判长期止步不前，在美国阻挠下争端解决机制陷于瘫痪，WTO的机制和公信力持续减弱。欧洲经济一体化也受到逆全球化势力的冲击，英国正式退出欧盟。另一方面，主要发达经济体关税税率在2008年后有所上升（图2）。美国加权平均的关税税率在2008年后有所上涨，最大涨幅为0.16个百分点；类似地，欧盟关税税率在2012年后出现回升，最大涨幅为0.65个百分点。此外，通过非关税贸易壁垒限制贸易的措施增多。根据WTO《总干事年度报告》，2018年10月16日至2019年10月15日，WTO成员方采用了102项贸易限制措施，包括关税、数量限制措施、严格清关程序等，共涉及价值约7469亿美元的产品，较上年同期大幅提高27%。^[1]在这些措施的影响下，全球产业链的参与度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出现逆转，从2008年的60%下降至2018年的55%。

[1]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Overview of Developme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ing Environment", November 29, 2019, [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SS/directdoc.aspx?filename=q:/WT/TPR/OV22.pdf&Open=True\[2020-03-20\]](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SS/directdoc.aspx?filename=q:/WT/TPR/OV22.pdf&Open=True[2020-03-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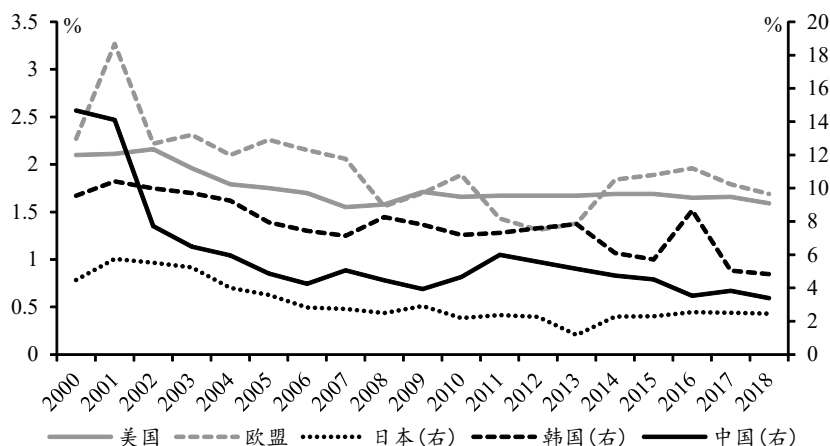


图2 主要经济体加权平均关税税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逆全球化浪潮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是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对外经济政策。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贸易政策以推动自由贸易、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为主。奥巴马政府更是为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降低了美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管制力度。^[1]与其不同，特朗普政府一直秉承“美国优先”的理念，通过退出或重谈贸易协定、采取双边或单边主义的手段等措施，增加美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促进美国制造业回流。宋泓指出，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包括五方面内容：1) 通过贸易政策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2) 通过减税和改革等措施加强美国经济；3) 通过谈判或重新谈判签订更有利于美国的贸易协定，包括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美韩自贸协定》等；4) 基于美国国内贸易法，发起301调查、232调查及其他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5) 改革多边贸易体制，主要涉及WTO争端解决机制、新规则谈判与形成功能以及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和优惠待遇等方面主张。^[2]

拜登上台后美国的经贸与外交政策将可能出现较大调整。一方面，拜登主张国际多边主义和国际规则，希望重启多边合作、重构盟友关系、恢复价值观外交，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有利于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另一方面，拜登政府的国内政

[1] 仲鑫、金靖宸：“中国入世后美国贸易保护政策的演变及对策”，《国际贸易》，2019年第2期，第24~31页。

[2] 宋泓：“美国式的‘公平、对等的自由贸易’——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述评”，《世界经济黄皮书：2019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张宇燕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83~297页。

策以鼓励创新的“美国制造”（Made in America）和后疫情时期经济复苏计划为主，同时还计划审查美国国际供应链中存在的国家安全风险，要求国会颁布每四年一次的强制性关键供应链审查法案，这可能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美国关键产业回流。

中国是面临贸易摩擦最多的经济体之一。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快速跻身高科技产业，并开始威胁到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中美关系进入质变期。2017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上任后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性为竞争对手。随后，美国政府不断加大对中国高科技的打压力度，规避和阻止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赶超。^[1]2017年美国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发起调查。2018年美国颁布《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决定外国投资人投资美国业务是否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方面的权限。受此影响，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从456亿美元（2016年）连续下降至50亿美元（2019年）。^[2]2019年以来，美国政府频繁对中国企业和单位实施“实体清单”管制，截至2020年底，中国（包含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中国大陆企业的海外子公司）已成为相关主体被美国纳入“实体清单”最多的地区。2018—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几度升级，严重影响了中国出口的外部环境，并打破了原有的产业链平衡。尽管2020年中美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双方在国有企业、产业补贴、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还存在诸多分歧，中美关系走向并不乐观。鉴于美国两党已达成对华强硬共识，拜登政府很可能会延续特朗普时期对中国的战略遏制，还可能联合其盟友打击中国。

外部环境变化对亚洲产业链既有总量上的影响，亦带来结构上的调整。从总量上看，逆全球化浪潮破坏了既有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打破了原有的产业链平衡，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风险，不利于跨国企业在全球布局和投资，也将冲击依赖国际分工而发展起来的亚洲产业链。尤其是，中国与大多数亚洲经济体存在密切的贸易往来关系，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和限制措施也将对这些经济体产生连带影响。从结构上看，外部环境变化将促使亚洲产业链在各经济体之间以及不同行业之间进行调整。在中低端产业上，亚洲经济体在劳动、土地、环境等要素成本上享有绝对优势，因而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外部环境变化对亚洲产业

[1] 张宇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5期，第9~19页。

[2] Rhodium Group, “Two-Way Street: 2019 Update US-China Investment Trends”, 2019, https://publications-research.s3-us-west-2.amazonaws.com/RHG_TW5+2019_Full+Report_8May2019.pdf[2020-06-15].

链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中低端产业在经济体之间的转移。比如，在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的影响下，纺织服装等行业加速从中国向东南亚和南亚经济体转移。而在高端产业上，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的对外贸易政策，同时加强了出口管制和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拜登政府则可能会在避免与中国脱钩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强对华高科技核心领域技术转移的限制，并通过制定国际规则规锁中国的高科技发展。这些举措会增加技术转移的壁垒，限制后发经济体通过学习模仿实现经济增长和赶超的可能性，甚至可能使一些经济体陷入“低端锁定”的困境。

新冠肺炎疫情从供需两端挤压全球产业链，强化已有的全球产业链变化趋势。2020年1至2月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武汉地区大暴发，3月国内形势不断好转，而海外疫情快速蔓延。进入秋冬季后，新兴市场疫情仍在不断发酵，美欧疫情出现二次抬头，甚至比第一波更为猛烈。尽管疫苗研发在2020年底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受疫苗效果、普及程度、民众态度等因素的影响，疫情发展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为了应对疫情，各经济体纷纷在货物贸易（包含医疗物资）、航班/列车/船舶、边境口岸、人员流动等方面采取限制措施。这些限制措施导致国际物流迟滞、货物贸易成本增加，使得商务往来和商业洽谈受到严重影响。此外，疫情迫使部分经济体工业生产中断，进而对产业链上下游经济体产生连带影响，使得亚洲和全球产业链短期供应中断的风险增加。复杂产业链、区域产业链中的枢纽经济体以及产业链上游供应商受冲击相对较为严重。^[1]从中长期看，疫情促使各经济体反思产业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问题，一些经济体出于经济安全的目的加速关键产业（医疗和高科技产业等）的回流或产业链的多元化。此外，疫情也为亚洲产业链进一步融合提供了机遇。在海外疫情不断蔓延的背景下，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亚洲经济体率先渡过疫情高峰期，并有序推进复工复产。亚洲在合力抗击疫情和产业链修复上的突出表现，以及逆全球化和疫情下全球产业链暴露出的内在脆弱性，进一步凸显了区域产业链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亚洲产业链的发展方向

亚洲产业链的发展方向包括国别和产业两个维度。从国别视角看，亚洲产业链将向多元化和区域化推进。

[1] 佟家栋、盛斌、蒋殿春、严兵、戴金平、刘程：“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全球经济与对中国的挑战”，《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3期，第9-28页。

第一，拓展均衡的多元化市场。根据国别经验，提升对外贸易市场的多元化程度是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应对产业链敏感性和脆弱性、规避单向依赖和市场波动的常规手段。多元化也是亚洲经济体增强产业链韧性的重要手段。这不仅表现为贸易伙伴数量的多元化，还表现为贸易伙伴份额的均衡化和产业链分工的不断细化。就贸易合作伙伴数量而言，近二十年来，中国、印度、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对外合作市场数量不断增加。比如，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印度提出的“棉花路线”（Cotton Route）与“季风计划”（Project Mausam），都有助于开拓国际市场，增加贸易伙伴数量和分散产业链风险。就贸易伙伴份额的均衡化而言，根据蒋小荣等采用的结构熵指标，亚洲多数经济体还有较大提升空间。^[1]就产业链分工而言，亚洲产业链的内部合作不断深化，主要经济体的产业链关联逐渐从竞争转向互补。例如，亚洲产业链在电子产品等高技术产品制造上呈现出互补多于竞争的贸易往来关系，在纺织服装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链上的竞争关系也开始向互补演变。

第二，加强区域一体化和区域共同市场建设。亚洲经济体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存在差异，在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上可以优势互补，国别和区域产业链有分工优化、提效增质及差异化竞争的空间。同时，增加亚洲区域内产业链合作、减少亚洲经济体对区域外增加值的依赖，有助于促进亚洲区域内经济发展，降低贸易保护主义和全球性突发事件等外部冲击对亚洲经济体产业链的影响。此外，随着发展中经济体市场的不断壮大，发展区域共同市场有助于对接亚洲内部的供给和需求，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根据麦肯锡《全球化大转型，贸易和价值链的未来在何方》的报告，1995—2017年发达经济体在全球消费中的占比从81%下降到62%，发展中经济体的占比则从19%上升至38%，其中亚洲占比从7%上升到18%，预计到2030年亚洲在全球消费中的份额将达到26%（超过一半来自中国）。^[2]然而，过去亚洲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和产业链融合主要依靠自由市场和双边协定，缺乏区域层面的贸易、投资和制度的协调安排，亟需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自贸协定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建设。

[1] 蒋小荣、杨永春、汪胜兰：“1985—2015年全球贸易网络格局的时空演化及对中国地缘战略的启示”，《地理研究》，2018年第3期，第495—511页。

[2]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Globalization in Transition: The Future of Trade and Value Chains”, January 2019,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innovation-and-growth/globalization-in-transition-the-future-of-trade-and-value-chains#2020-03-20>.

从产业视角看，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将呈现不同的重构路径。

第一，劳动密集型产业将继续向东南亚和南亚转移。劳动密集型行业对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变化较为敏感，但对技术水平、资本设备、产业配套和基础设施的要求相对较低，因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从高收入向低收入经济体转移的特征。以纺织服装业为例，该产业自工业革命以来先后经历了从英国向美国（20世纪上半叶）、从美国向日本（20世纪50年代）、从日本向“亚洲四小龙”（20世纪60-70年代）、从“亚洲四小龙”向“亚洲四小虎”和中國大陸（20世纪80-90年代）的四次转移。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大陆人力成本快速攀升。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研究，2014年上海普通工人的月基本工资是东南亚和南亚经济体相应城市的1.15~6.97倍，其中与缅甸、越南差距最大。尽管目前中国大陆依然是全球出口纺织服装产品和纺织原料最主要的经济体（2018年出口占比仍有44.9%），但随着人力成本快速攀升，纺织服装产业已经向人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南亚以及非洲等地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在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已经发生，未来也将在成本因素的推动下继续推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大陆与同类经济体的关系也将从竞争多于互补向互补多于竞争的情况演变。

第二，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区域一体化在保障产业链稳定性和安全性上将发挥更大作用。从供给端看，这类产业链依赖产业集群且需要较高的技术知识，而亚洲经济体具备高端产业的制造基础。以电子产业为例，在高技术电子产品制造上，一方面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具有较高竞争力，另一方面欧美企业投资设厂也提升了亚洲在该行业的竞争力。在制造中低技术电子产品方面，中国大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均具备较强的生产能力。从需求端看，亚洲未来的经济增长有赖于对新兴技术的掌握，但目前亚洲多数经济体在电子和机械产品上对欧美国家存在一定依赖。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构建的信息技术时代，新兴技术将改变传统工业的生产方式，增加发展中经济体经济赶超的技术壁垒，亚洲经济体只有抱团取暖，加强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链上的合作，方能避免被“低端锁定”的风险。对于电子产品而言，一方面，亚洲对美欧增加值依赖相对较低，最有可能率先开展区域产业链合作。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大陆是全球电子产品产业链中最大的枢纽，2015年进、出口占比分别为30.4%和29.1%，但仍主要负责中低端电子产品的生产或高端电子产品中低端生产环节。亚洲仅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高端电子产品生产中能与美欧比肩。

中国大陆在亚洲产业链中的位置将向微笑曲线的两端攀升。从产业层面看，

伴随着以纺织服装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中国大陆向东南亚和南亚转移，留在国内的企业将转型为中间品供应商或者设计、营销和售后等服务商，进而向产业链的上游或者下游迁移。在新兴技术领域，尽管面临较大阻力，中国大陆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先发优势和市场优势，能够在亚洲产业链中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比如，2005—2016年，中国大陆在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上升达14.9个百分点。从外部环境看，中国大陆在贸易摩擦、产业链安全性和高端技术转移上面临更大的压力。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一部分以美国市场为导向的行业已经转移到美国进口关税更低的其他地区，比如越南和墨西哥等。未来在产业链调整过程中，中国大陆企业有动机通过加强亚洲区域合作，提高产业链中位置和产品竞争力，减少或避免与美欧国家间的直接贸易争端。

结 论

本文基于贸易数据，讨论了亚洲产业链的现状及演变，分析了外部环境变化对亚洲产业链的冲击，进而研判亚洲产业链的发展方向。全球产业链格局演变和亚洲产业链内部调整是研究亚洲产业链现状及演变的两个视角。一方面，亚洲产业链的崛起促使全球产业链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在近二十年中，亚洲与欧美产业链之间的贸易往来明显加强，亚洲产业链中区域内贸易占比也不断上升。另一方面，亚洲产业链内部分工不断优化。在中高端产品制造上，亚洲主要经济体总体上呈现互补关系；在低端产品制造上，也处于由竞争向互补转变的过程中。逆全球化浪潮对亚洲产业链产生了明显影响，从总量上减少了国际贸易往来与外商直接投资，从结构上促进了亚洲产业链的内部调整。新冠肺炎疫情从供需两端挤压全球产业链，强化已有的全球产业链变化趋势。从中长期看，疫情促使各国反思产业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问题，也为亚洲产业链进一步融合提供了机遇。从国别视角看，亚洲产业链将向多元化和区域化推进，包括拓展均衡的多元化市场、加强区域一体化和区域共同市场建设等。从产业视角看，亚洲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会更加趋于互补，其有望在高新科技领域加强合作。劳动密集型产业将继续向东南亚和南亚转移，而区域一体化将在保障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业链稳定性和安全性上发挥更大作用。■

（责任编辑：邱静）